

晋商与金融史论

JIN SHANG YU JIN RONG SHI LUN

孔祥毅
著

山西财经大学
【晋商研究当代文库】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臺灣社會學研究

第 10 卷 第 1 期

臺灣社會學研究
| 臺灣社會學研究 |

晋商与金融史论

JINSHANGYUJINRONGSHILUN

孔祥毅 著

山西财经大学
【晋商研究当代文库】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晋商研究当代文库/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主编.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8. 2

ISBN 978 - 7 - 5096 - 0210 - 2

I. 晋… II. 山… III. 商业史—山西省—文集
IV. F729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7601 号

出版发行: 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 8 号中雅大厦 11 层

电话: (010) 51915602 邮编: 100038

印刷: 北京银祥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

组稿编辑: 杜 菲

责任编辑: 杜 菲

技术编辑: 晓 成

责任校对: 超 凡

720mm × 1000mm/16

28.25 印张 570 千字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全 12 册 总定价 432.00 元

书号: ISBN 978 - 7 - 5096 - 0210 - 2/F · 206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印装错误, 由本社读者服务部
负责调换。联系地址: 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 号

电话: (010) 68022974

邮编: 100836

山西财经大学

《晋商研究当代文库》

编委会

学术顾问：孔祥毅 张正明
编委会主任：杨怀恩 原梅生
编委：樊而峻 郭泽光 赵国浩 崔满红 王 森
黄鉴晖 葛贤慧 武三林 阎应福 孙长青
张亚兰 王永亮 乔 南 陶宏伟
主 编：崔满红
编辑部主任：王永亮
编 辑：陈 啸 薛秀艳 杨志勇 侯海燕

总 序

山西是中国商业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山西商人是中国经济史上的劲旅，明清晋商更是因创造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历史奇迹而成为当时中国十大商帮之巨擘。历代晋商及其成就的辉煌事业虽然早已渐次消逝，但他们从崛起到兴盛、由兴盛而衰落的史实却蕴藏着丰富而绚烂多彩的知识瑰宝，在经济、管理、社会、艺术、法律等多学科领域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山西财经大学是国内建校时间最早的财经类高等院校之一，是从乔家大院走出来的商科大学。经济学、管理学始终是学校的优势学科，晋商研究始终是学校科研工作的特色之一。学校有组织的晋商研究工作已有近 50 年的历史。

1960 年，原山西财经学院成立了山西票号史料整理小组，开始了晋商史料挖掘和研究工作。经过 30 年的研究，推出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以《“山西票号”的性质与作用》（杨荣晖，《光明日报》1961 年 5 月 22 日第 4 版）、《山西票号研究集·第一集》（山西财经学院 1982 年编印）、《山西票号研究集·第二集》（山西财经学院 1984 年编印）和《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 年初版）为主要代表，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1991 年开始，原山西财经学院的晋商研究工作突破了经院范式，呈现出历史考证与现实借鉴相结合、学术研究与社会服务并举的特色。1997 年 10 月，原山西财经学院和原山西经济管理学院合并，更名为山西财经大学，学科特色和学术传统得以继续和加强。2002 年，学校建成了金融货币史博物馆。2004 年，山西省教育厅依托我校建立了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山西票号与晋商研究中心。这个阶段，我校的晋商研究视角不断拓展，研究成果更加丰硕——《山西商人及其历史启示》（孔祥毅、张正明，《山西日报》1991 年 11 月 18 日、19 日连载）、《山西票号史》（黄鉴晖，山西经济出版社，1992 年初版，2002 年修订）、《明清山西商人研究》（葛贤慧，香港欧亚经济出版社，1992 年）、《中国银行业史》（黄鉴晖，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 年）、《商路漫漫五百年》（葛贤慧，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 年）、《金融贸易史论》（孔祥毅，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 年）、《晋商经营之道》（黄鉴晖，山西经济出版社，2001 年）、《明清山西商人研究》（黄鉴晖，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 年）、《晋商在会计发展史上的贡献》（孔祥毅，《山西财经大学

晋商与金融史论

学报》2002年第2期)、《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增订)、《山西票号研究》(孔祥毅、王森,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山西票号与中国商业革命》(孔祥毅,《金融研究》2002年第8期)、《金融票号史论》(孔祥毅,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版)、《镖局、标期、标利与中国北方社会信用》(孔祥毅,《金融研究》2004年第1期)、《中国钱庄史》(黄鉴晖,山西经济出版社,2005年)、《中国典当业史》(黄鉴晖,山西经济出版社,2006年)是其中的代表。

近年来,学校为了提高教育质量、突出办学特色,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商科大学教育教学模式的要求,明确将传承晋商文化、弘扬晋商精神、构建学科体系、培养商科英才作为办学指导思想,并加大了各项投入,在科学研究、课程改革、教材编写、博物馆建设等多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2007年,学校将山西票号与晋商研究中心更名为晋商研究院。为了秉承学术传统,强化办学特色,开创晋商研究工作新局面,学校设立了晋商研究专项基金,责成晋商研究院编辑、出版了这套“晋商研究当代文库。”

本文库不限定册数,不定期出版。今后将陆续推出新的相关研究成果。

热忱期待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孔祥毅

2008年1月10日

前 言

这本文集，实际是2003年4月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的《金融与金融史论》的续集。《金融票号史论》汇集了我1978~2002年关于晋商、票号与中国金融史方面的研究论文。2003年以来，我又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还有一些学术报告的演讲稿，现集结出版，定名《晋商与金融史论》，其内容仍然是关于晋商、票号与金融史的。

1997年秋，在中国商业史学会与山西财经学院晋商与票号研究中心召开的中国商业史学会明清专业委员会成立及学术讨论会上，我提出了“晋商学”的概念，得到胡平、吴承明、方行等老一辈专家的认可。2000年，我对晋商学研究的对象与内涵提出了进一步的看法。现在，晋商学的概念已经成为山西学者们的共识。

晋商学以明清到民国时期山西商人及其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的活动为研究对象，探讨山西商人资本发生发展的轨迹，研究晋商企业的经营战略、管理制度、企业文化，研究晋商与政府、与外商、与亚欧经济交往的关系，研究晋商精神、商业伦理、哲学思想，研究晋商教育、科学研究、戏剧、武术、建筑等各方面的创新与特点，是探讨中国金融贸易与社会文化活动规律性的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科学。晋商学要研究晋商的企业制度、经营管理、市场营销、金融业务、会计财务、账簿票据、人才培养、戏剧文化、建筑艺术、民风民俗，等等，还要研究商人与社会其他群体的关系、商人精神及其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

晋商的哲学思想是中和之道，执两用中，无过不及，处人适情，处物适则，处事适理，主张人和、物义、事中。晋商理财与经营，坚持中为道，和为本。晋商认为经商是与人打交道、与物打交道，处人、理事、经营，要道御经营，和贯始终。晋商主张义利相济相通，见利思义，先义后利，以义制利。晋商在空间上的覆盖面、时间上的延续性、制度上的特殊性，使其商业道统绵延久长，诸如关公崇拜的商业伦理等影响了各大商帮以及海外华商——当代大小商场几乎无不供奉关帝圣君。

由于晋商在财富积累、活动舞台、企业制度、社会影响等各方面都稳居十大商帮之领先地位，所以中国的重商思想也较早地出现在山西，到明末清初已经产生了商人思想进入上层主流社会的要求。明末清初，祁县商人戴家修建的“丹枫阁”，

晋商与金融史论

就是傅山、顾炎武、戴廷弼以及阎尔梅、阎若璩、王士禛、屈大钧一批具有重商思想的学者们的聚会之所。这些名士多有商人家族背景，他们站在商人立场上，呼吁商人进入主流社会。傅山提出“市井贱夫可以平治天下”的主张，他认为商人最懂得商品生产、交换、流通、供求以及财富创造、经营管理，他们善于理财，懂得财富对社会的意义。傅山说：“何以聚人？曰财。白然贫士难乎有群矣，家、国亦然。故讳言财者，自是一教化头骨相耳。常贫贱骄语仁义之人，大容易做也。”^①“生人之有为也，本以富生人。富生人，而治人者乃有为。”^②明确提出有为的人重要的是创造财富。李贽也说：“不言理财者，决不能平治天下。”^③光绪初年山西一次乡试，试题是“西商富华商困的原因”。一位举子写道：“良由商学无专门，商律无专条，商会无专责，而中西商情悬绝。”这个答案是精彩绝妙的。

一个理性社会的形成，需要思想家和政府的引导，需要公共知识分子和社会媒体向大众传播。晋商文化、晋商伦理是今天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社会资本。政府确立了天地之间人为贵、以民为本、实惠于民、“利民而不费”、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的执政理念，企业家确立了独富贵君子为耻、大富大红大德、相济于业、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经营思想，社会形成了仁爱、正义、礼让、理智、诚信的氛围，和谐社会就是可以看得见的目标。在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人的行为必然会受到历史传统的影响，其“路径依赖”原理决定了当代中国商人精神对明清商业精神的传承性，当然变异也是有的，这也是时代变化的必然。研究晋商学，弘扬晋商精神、中国商人精神是当今建设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的社会资本。

票号是山西商人资本发展的产物。“货通天下”必然要求“汇通天下”，为商品经营资本服务的货币经营资本自然地要从商品经营资本中分离出来。山西商人最早发展了典当、钱庄，创办了印局、账局、票号等多种金融机构，成为中国土生土长的银行业的先驱。与之相应，凭帖、兑帖、上帖、上票、期帖、壶瓶帖、汇票等金融工具^④先后产生，金融机构为商人办理存款、贷款、汇款、转账结算以及金融机构之间的票据交换、轧差清算和银行业的委托业务、代理业务等逐渐发展起来。在外国资本进入之前，中国已经有了自己的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金融业务、金融制度。在外国资本进入以后，中国货币商人吸收了外国金融业的先进的经营技术和管理经验，使传统的土生土长的中国早期金融业得以进一步发展。

近百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向哪里发展，是学习西方还是弘扬传统，时有争论。主张学习西方者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延续太长，封建糟粕根深蒂固，必须引进西方制度，甚至照搬西方一切；主张弘扬传统者则认为泱泱大国，传统文化，至善至美，

① 魏宗禹：《晋阳人文精神》，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

② 傅山：《霜红龕集》卷35，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③ 李贽：《大学评》。

④ 这些票据是中国早期的本票、支票、银行汇票、商业汇票、融通票据和旅行支票。

前 言

必须独立自主发展自己。其实，历史虚无主义是不对的，拒绝学习别人的长处也是不对的，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虽然中国金融业第一家挂“银行”牌子的金融机构是1845年的香港英商丽如银行，第一家挂“保险”牌子的金融机构是1905年广州英商谏当保安行，第一家挂“证券交易”牌子的金融机构是1891年上海外商“上海股份公所”，由此认为金融业是西方输入的，银行是舶来品。其实，这是不对的，中国的金融业不是舶来品，但是也没有拒绝来自海外的营养。

国家是有国界的，但是市场与文化却没有边界。中国经济金融发展，既要总结自己，也要学习别人，既要弘扬传统，更要在学习别人的同时不断创新。

这里讲的这些话，也许是多余的。但是，这是我学习研究晋商、票号和中国金融史的体会。在这本书中，通过历史分析，试图讨论一些金融贸易的理论问题，观点未必都是正确的，但是书中所引历史资料将会为读者研究思考经济金融问题提供有益的参考。论点也许不是长生的，但是史料却是万岁的。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山西财经大学领导与晋商研究院的支持与资助，得到了经济管理出版社的支持与帮助，在此特致诚挚的谢意。

孔祥毅

2008年1月20日

目 录

2003 年	1
鏖局、标期、标利与中国北方社会信用	3
再塑当代晋商新形象	14
诚信晋商的历史与现实	18
山西票号的利润导向	27
日升昌票号的兴衰	36
山西名商小传	39
2004 年	43
喜看晋商及其票号研究的后来者	45
晋商精神	47
苏商与晋商:竞合、差异、经验与教训	57
山西商人对中国会计史的贡献	63
山西与山西人要为中央银行制度作出更多的贡献	76
山西金融机制创新的历史变迁	80
从山西票号的兴衰看金融协调	102
晋商文化及其特点	110
晋商商会与晋商文化的发展	117
“人身股”能够为企业改革注入活力	125
2005 年	133
山西票号的风险控制及其现实意义	135
诚信晋商与信约公履制度建设	149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山西的产业结构调整	189
山西商人与中国金融革命	198
中央银行的制度变迁与功能演进	216
山西票号高效执行力的动力机制	225
欧洲金融体系:世界的范式	232
南汉宸:新中国的第一位金融家	243

晋商与金融史论

2006 年	253
乔家商业的兴衰	255
晋商的商路与舞台	260
晋商的商业伦理	266
诚信是金融的生命	275
票号的组织制度与经营管理	283
论金融先导	293
晋商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301
2007 年	309
晋商文化:和谐发展新山西的社会资本	311
晋省商帮溯源	317
晋商称雄	342
500 年辉煌看晋商成败	351
《晋商学》研究的发展	356
晋商:挈领中国商人精神	358
晋商的企业制度	365
汾酒商人转型研究	374
晋商的商事纠纷与诉讼	382
附 录	389
以古为鉴 学以致用	391
一篇在山西引起反响的好文章	393
紧紧追赶时代的潮汐	395
华章编就答恩师	397
金融学专家孔祥毅	400
高韵声声谱新曲	404
抚今追昔话晋商	410
晋商文化三家谈	416
孔祥毅:从寒门孺子到经济学家	418
反思百年曲折变迁轨迹,探寻未来协调发展路径	422
如歌岁月师伴行	424
孔祥毅:40 年浓缩 500 年	433
道德与制度:谁更有效	438

2003 年

镖局、标期、标利 与中国北方社会信用

本文原载《金融研究》2003年第8期。2005年12月山西人民出版社《黄河文化论坛》第14辑选用。文章分析了清中期到民国初年中国北方地区通行的镖局、标期、标利与社会信用状况,认为标期是晋商的社会信约公履期,镖局、标期、标利制度构成了当时社会商品信用交易、资金融通的债权债务清偿网络体系与制度,在当时,没有长期相互拖欠不能清偿的三角债。镖局、标期、标利也是当时市场利率形成与决定的机制,是当时成熟的民间信用制度。这是晋商的创造,也是17~20世纪初晋商发展的原因之一。

17世纪中期到20世纪30年代,以山西中部与口外(长城以外)为中心的中国北方商品交易中,由商品赊销和货币借贷引起的债权债务的清偿和结算,在偿还期限、利息计算等社会信约履行问题上通行标期和标利。标期、标利又是由于镖局运送现银引起的。所以镖局、标期、标利与山西商人的商业活动以及金融机构票号、钱庄、账局等共同构成了一个债权债务清偿网络体系,商号、住户与金融机构都能够自觉执行这一制度,成为了以山西太谷为中心、以晋中各县与口外张家口、丰镇、归化、包头、宁夏、兰州为重点的中国北方地区的商业习惯,构成了一幅北方中国民间商务清算网络,这是清朝中期到民国初年中国经济与社会的一大特色。

这里需要说明,“标期”、“标利”是随镖局押送现银周期而来,本应该是“镖期”、“镖利”。但是长期以来,包括一些近代史料,人们亦常常写作“标期”、“标利”,把标期的债权债务的清算叫做“过标”。既然“标期”、“标利”的提法已经长期使用,一些史料也采用这种提法,成为约定俗成,我们在这里也就不必强调“镖”和“标”的差异了。

一、镖局是押解实物和货币资财 安全运转的专业机构

镖局是押解实物和货币,保卫其安全运转的专业机构,带有一定的保险性质。镖局这种专业保卫组织,什么时候产生,说法不一。有说镖局是在清乾隆年间出现:“考创设标(镖)局之鼻祖,乃系清乾隆时……山西神拳无敌张黑五者请于达

摩王，转奏乾隆，领圣旨，开设兴隆镖局于北京顺天府前门大街，嗣由其子怀玉，继以走镖，是为镖局之搞矢。”^①据著名考据学家卫聚贤先生说，相传为清初顾炎武与傅山、戴廷弼为了反清复明而创设。他们招雇有武功的人，积蓄革命力量，为躲避清政府的注意，以保护商人运送现金或货物为名，组织镖局。镖局所雇武术高超的人，叫镖师傅，腰系镖囊，内装飞镖，手持长矛，于镖车或驮轿上插上一个小旗，上书镖师傅的姓，因怯于镖师傅的大名，强盗不敢来犯。戴廷弼是山西祁县人，明末清初思想家，出身于山西商人之家，与山西太原傅山和江苏昆山顾炎武为好友，卒于1694年（康熙三十三年）。卫聚贤先生考证，蒲松龄写《聊斋》是在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书中已经提到镖局，可见在康熙年间镖局已经存在。戴廷弼在山西祁县城建有“丹枫阁”，丹者，朱也；枫，祁县发音洪，阁与武为音转，连起来寓意为“朱洪武”。由于反清复明的政治意识，顾炎武与傅山等常在这里聚会，利用山西商人在全国各地经商的大量物资押运和现银押解需要保镖的背景，组设镖局。^②祁县戴家是著名的形意拳的传人，形意拳的发展与镖局有密切联系。著名的山西票号志诚信的东家太谷县沟子村员家后人员文绣在其回忆文章中说，1679年（康熙十八年），其先祖员成望创设志诚信票号，“在太谷西大街设总号，随即在北京打磨厂开办了义合昌汇兑庄和志一堂镖局（也称隆盛镖局）。”^③看来，镖局创立时间最迟在康熙年间。

二、标期的空间和时间

（一）镖局、标期与金融中心

镖局押运物资和现银的路线、时间，即从某地出发到某地，是由商品贩运交易决定的。山西商人的活动舞台虽然遍及全国以至国外，但是其重心还是在北方，特别是出东口、西口，商于蒙古、东北和西北地区。所以镖运商品和现银，以至支付清算主要是在张家口、归化与大本营——晋中盆地太原、汾州两府。太原、汾州两府中，又主要集中在太谷县。如果说清代中国的金融中心之一在山西，那么山西的

① 万籁声：《武术汇宗》，商务印书馆，转引自卫聚贤：《山西票号史》，重庆说文社，1941年。

② 卫聚贤：《山西票号史》，重庆说文社，1941年。

③ 员文绣口述、董维平整理：《我所了解的员家志诚信票号》，见《晋商史料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金融中心在太谷。其根据可以分述如下几点：

第一，据史料记载，“太谷县在当时经济上占大优势，其一县之势力可抵榆次、祁县、平遥、介休等数县”。^①太谷和省城太原比较，实力也比较强。太原是在民国以后才很快发展起来的。按照民国时期实业部的调查，“太原省城，昔年原非金融中心，民国以后，因银行号纷纷成立，至今虽不能谓为全省金融之总枢纽，但其金融势力，在全省境内，亦颇不弱”。^②在清代，“山西金融之中心，确在太谷”。^③

第二，太谷的金融机构比较多。清代的山西金融统计数字现在很难找到，这里比较一下抗日战争以前1935年（民国三十四年）晋中榆次、太谷、祁县、平遥、汾阳几县的金融情况，大体上可以看出太谷的金融地位。从钱庄看，太谷10家，总资本16.5万元，平均每家资本1.65万元，存款200万元，放款200万元；平遥9家，总资本6.1万元，平均每家资本0.68万元，存款100万元，放款100万元；祁县2家，总资本1.9万元，平均每家资本0.9万元，存款不详，放款10万元；榆次9家，总资本11.6万元，平均每家资本1.15万元，存款70万元，放款60万元；汾阳4家，总资本5.3万元，平均每家资本0.7万元，存款不详，放款20万元。从银号看，太谷8家，存款206万元，放款176万元；平遥3家，存款11.6万元，放款2.2万元；祁县3家，存款18.5万元，放款不详；榆次1家，存款放款不详。从金融机构总家数看，银行、银号、钱庄、当铺、质铺等总数，太谷57家，平遥43家，祁县20家，榆次23家，汾阳14家。虽然在清代，票号数依次为平遥、祁县、太谷，但是除汇兑业以外，其他金融机构太谷还是领先的，例如当铺质店，在1887年（康熙十三年），太谷88家、平遥65家、祁县63家、榆次63家、汾阳25家。^④

第三，太谷金融业的实力和信誉比较高。山西省财政金库收缴税银，“其元宝上有太谷县孟家银炉所印的‘孟合’二字，即当作十足银使用而不化验”。^⑤太谷银炉所铸造的银元宝流通广，数量多，今天流传下来的也比较多。

第四，山西省总商会设在太谷。在太谷，进行着大量的批发贸易，金融交易亦多批发趸售，从事批发出者称为“交行庄”。所以1904年山西省商会成立时不设在省城太原，而在太谷县城。

第五，镖局运送现银以太谷为中心。镖局运送现银先集中在太谷，进行债权债务的清偿，并且确定下一标利率，然后其他县城以其与太谷县城的距离，确定标期，以太谷标的标利为其他各县利率的基准。可见标期、标利以太谷为中心，向各县辐射。因而在标期的地域空间上太谷县独占一标，其他县统属太谷标。太原、汾阳两府除太谷外，其他各县的标期都在太谷之后。以时间和空间共同决定标期，形成了以太谷为中心的晋商金融贸易清偿和支付的网络体系。

①③⑤ 卫聚贤：《山西票号史》，重庆说文社，1941年。

②④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山西省》，民国三十五年一月。